

中文圣经流源

認識教會歷史往往會從教會的發展著手，看看教會是怎樣成長的。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教會歷史，看看教會在做甚麼。翻譯聖經是教會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工作，看中文聖經譯本的發展過程，看我們的教會怎樣漸趨成熟。

其實，我們不可能抽離地讀教會歷史，歷史的發展必與地理有關。透過研習地圖去看教會的發展，我們可能會有新的發現。《聖經教會歷史地圖集》即將出版，屆時讓我們一同從新的角度瞭解聖經和教會歷史。

中文聖經譯本流源

聖經翻譯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已開始，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紀才有把聖經譯成中文的文獻——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”。大秦即羅馬；景教即基督教的聶斯脫略派。此派始於敘利亞，其始創人聶斯脫略因提倡“基督二位二性說”而於公元 431 年被教會第三次大公會議定為異端，然而，此派積極傳教，公元 635 年（即唐太宗貞觀九年）聶斯脫略派傳入中國。公元 781 年（即唐德宗建中二年）建立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”。碑文講述人類的墮落、彌施訶（即彌賽亞）的降生、救主在世的事蹟等及介紹景教入華、盛衰的經過，也有景教經典《尊經》翻成中文的記載。景教經典包括可能是將舊新約聖經翻譯的部分，可惜這些經書的譯本全都失傳，有待考古學的新發現，方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。

直至十三世紀中葉羅馬天主教來華，聖經中譯才有新的發展。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維諾神父所譯的蒙古文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。其後有利瑪竇神父的“祖傳天主十誡”、巴設神父的白話文四福音、保羅書信及希伯來書、陽瑪諾翻譯四福音的《聖經直解》、賀清泰教士的《古新聖經》等。《巴設譯本》更可能成為後人馬殊曼和馬禮遜譯經時的藍本。

十八世紀末，隨著基督教來華，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了。繼《馬殊曼譯本》後，有馬禮遜的《神天聖書》及其修譯本《新遺詔書》和《舊遺詔書》、郭實臘修訂的《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》、太平天國刪改的《舊遺詔聖書》及《新遺詔聖書》。

十九世紀中葉，第一部由不同差會宣教士聯手翻譯的《委辦譯本》面世。譯員不但把聖經重譯，更統一了經文中的名稱和名詞。這次譯經工作是一項突破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，如：各代表在神學立場上出現分歧，“神”、“上帝”之間的抉擇等，加深了差會對譯經的瞭解，也作為日後譯經工程的借鏡。

裨治文中途退出委辦會，與克陞存、文惠廉等出版了《裨治文譯本》。後來最早退出委辦會的浸信會邀請宣教士高德、羅爾和迪因按□宗派的立場修訂《馬殊曼譯本》為《高德譯本》。

自十九世紀初，由於語文的發展，傳統思想和觀念的動搖，開啓民智、培植國力的急務，一貫只有讀書人、文人所認識的文言文漸漸應不上當時在文字方面的需要，較通俗的淺文理文便應時而起。聖經的翻譯也為滿足大眾的需要，淺文理的譯本紛紛出版，例如：《楊格非淺文理譯本》、《包約翰、白漢理淺文理譯本》、施約瑟的《二指版》等。《二指版》的得名就是譯者施約瑟在翻譯舊約官話譯本後中暑癱瘓，只能用兩隻手指工作。他獨力翻譯十多年，出版了一本淺文理譯文。

淺文理譯本雖受歡迎，但只是一段很短的過渡譯本。十九世紀中葉，由於當時朝廷和各地官員所用的語言（即官話，今天的國語），適用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地域，要更有效地把福音傳給中國人，官話譯本聖經就不能或缺了。宣教士也對此十分積極，不遺餘力地翻譯官話聖經，先後有麥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寫《委辦譯本》的《新約全書》、當代有名的漢學家：包約翰、艾約瑟、施約瑟、白漢理、丁韞良等以《麥都思、施敦力官話譯本》為藍本翻譯的《北京官話新約全書》、施約瑟依照《北京官話新約全書》體裁翻譯的《舊約譯本》、英國聖公會將《北京官話新約全書》和施約瑟的《舊約譯本》合印的《新舊約全書》、楊格非將其淺文理新約以白話文重寫的《楊格非官話譯本》、蕭靜山的《新經全集》等，還有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《官話和合本》（後稱《國語和合本》，現簡稱《和合本》）。

《官話和合本》可說是中譯聖經的一個重要里程，為聖經翻譯掀開新的一頁。在當時幾十種聖經譯本中，教會和信徒實在需要一本劃一的標準聖經。其實這個“呼聲”很早已經出現，可惜在神學觀點上的分歧不是容易“劃一”的，翻譯《委辦譯本》的經驗就是一個好例子了。

1890年，上海舉行了宣教士大會，由各個差會派代表出席。大會通過進行翻譯和合本的工作，為文言文、淺文理和官話譯本劃一標準；並成立三個委員會負責翻譯這三種譯本。

《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》最早完成。深文理則波折重重，工作十六年《深文理和合新約聖經》才出版。後來，淺文理與深文理兩翻譯小組合併，《文理譯本全書》則於合併後十二年出版。至於《官話和合本》翻譯小組由於推選譯員的問題，工作十六年才完成新約，再工作十三年，舊約完成，並正式易名為《國語和合本》。

《和合本》聖經的譯者是以“忠於原文”為目標，就是要“堅持文字上的準確”，但由於譯經原則改變，這個目標就有新的理解：“重視意義上的準確”。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，新約經過了多次的修訂，使其譯文更清楚、優美。《和合本》實在為教會提供了一部翻譯比以前更準確、更適合大眾閱讀的譯本，於是它就成了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，漸漸建立起典範的權威，成為主流，也為教會和信徒的語言系統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基督教詞彙。

然而，隨著考古學家不斷有新的發現，聖經學者對原文和聖經的歷史背景的認識越來越多，修訂譯本或重新翻譯更準確的聖經譯本實在無可厚非。同時，語文隨著時代而轉變，在《和合本》出版後數十年間，中文現代化的過程並不曾停止，很多字詞的意思已有別於當日了，語法文體的運用也改變了。教會實在需要一本翻譯更理想和更適合當代入閱讀的聖經譯本。

近年，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，五十年代有徐匯修院的《新譯福音》、狄守仁的《簡易聖經讀本》、蕭靜山按希臘文再修訂的《新經全集》；六十年代有今天天主教教會仍然採用的《思高聖經譯本》；七十年代有《呂振中譯本》、《當代福音》、《新約全書新譯本》、《當代聖經》、《現代中文譯本》及至九十年代的《聖經新譯本》；也有於八十年代修訂《和合本》的《新標點和合本聖經》；還有本會（國際聖經協會）尚在翻譯的《新漢語譯本》、及其他的翻譯工作

譯經工作是不竭不止的。從歷史中，我們看到此項工作未曾停止過，一直在進行著，也必須繼續。

今天，我們或會對各個聖經譯本的強弱處很有興趣，但是我們必須明白，讀哪個譯本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從中讀到一些信息。沒有一個譯本是完美的，但是神總會藉著我們所看的譯本對我們說話。我們讀經，神就清楚明白地對我們說話。在云云的譯本中，正如保羅所說的：“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，也有的是出於好意。”但“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怎樣，基督究竟被傳開了。為此，我就歡喜。”（腓一 15, 18）

附表

年分（公元）	譯本
781 年	景教碑
十三世紀末、十四世紀初	《若望孟高維諾譯本》：詩篇、新約全書（蒙古文）
十六世紀末	利瑪竇譯“祖傳天主十誡”
1636 年	陽瑪諾的《聖經直解》
約 1700 年	《巴設譯本》
十八世紀末	賀清泰《古新聖經》，未有印刷發行
1822 年	《馬殊曼譯本》
1823 年	馬禮遜《神天聖書》

1837 年	麥都思、郭實臘、裨治文、馬儒漢《新遺詔書》
1840 年	麥都思、郭實臘、裨治文、馬儒漢《舊遺詔書》 郭實臘修訂的《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》
十九世紀末	太平天國刪印《舊遺詔書》為《舊遺詔聖書》 刪改《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》為《新遺詔聖書》（附註解）
1850 年	《委辦本四福音》
1852 年	《委辦譯本新約全書》
1953 年	高德修譯的《新約全書》
1854 年	《委辦譯本》
1857 年	麥都思、施敦力改寫《委辦譯本》的新約官話譯本
1859 年	《裨治文譯本》的新約
1862 年	《裨治文譯本》
1866 年	《北京官話新約全書》
1868 年	高德、羅爾悌、迪因修譯的《舊約全書》
1872 年	《北京官話新約全書》（改訂本）
1875 年	施約瑟的《北京官話舊約全書》 王多默的《宗徒大事錄》
1878 年	《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》
1885 年	楊格非的《新約淺文理譯本》
1889 年	楊格非的《新約淺文理譯本》（修訂版） 包約翰、白漢理合譯的淺文理新約全書 《楊格非官話譯本》
1892 年	德雅的《四史聖經譯註》
1897 年	李問漁的《新約全書》
1902 年	施約瑟的《二指版》
1905 年	楊格非的《舊約淺文理譯本》（至雅歌）

1904 年	《淺文理和合新約聖經》
1906 年	《深文理和合新約聖經》 《官話和合譯本新約全書》
1919 年	《文理和合本》 《國語和合譯本》
1946 年	吳經熊的《聖詠譯義》
1949 年	吳經熊的《新約全集》
1954 年	徐匯修院的《新譯福音》
1955 年	狄守仁的《簡易聖經讀本》
1956 年	蕭靜山的《新經全集》
1967 年	蕭鐵笛的《新約全書》
1968 年	《思高聖經譯本》
1970 年	《呂振中譯本》
1974 年	《當代福音》
1976 年	《新約全書新譯本》
1979 年	《當代聖經》 《現代中文譯本》
1993 年	《聖經新譯本》